



史前海岱地区大口尊传播路径研究^{*}

徐昭峰 王凯凯

摘要:大口尊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在同时期及略晚的太湖、中原、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也有发现。太湖、中原、江汉等地区的大口尊均源于海岱地区。海岱地区大口尊的传播路径是通过海陆两条路线传播到太湖地区的,并通过中原地区传播到了江汉地区。海岱地区大口尊应该是一种具有礼器性质的酿酒器具,其功能在传播过程中未发生较大变化。大口尊传播反映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海岱、太湖、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间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古史传说中东夷、华夏、苗蛮等集团的活动相对应,对重建中国史前史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口尊;传播;路径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6-0016-09

大口尊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在同时期及略晚时期的江汉、太湖地区的诸多考古学文化遗存中也屡有发现,通过对比发现以上区域内出土的大口尊形制相似,其中应存在一定联系。根据材料,海岱地区大口尊出现的年代最早,其发展演变过程也比其他地区大口尊更加完整^{[1]132-139},因此海岱地区大口尊与其他地区的 大口尊应该存在着传播关系。

韩建业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是东夷集团,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是苗蛮集团,苗蛮集团是东夷集团的一支迁徙到江汉地区后形成的,其迁徙路线是从周口地区向西南穿过南阳盆地,最后进入江汉地区^[2],而这条迁徙路线与大口尊向江汉地区传播的路线应是相吻合的。高广仁、邵望平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通过江淮地区与太湖地区的崧泽、良渚文化建立了联系^{[3]103-108}。栾丰实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与崧泽、良渚文化的交流存在陆路与海路两条路线^{[4]134-155}。

上述学者对于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的研究为探讨该区域史前时期大口尊的传播路线奠定了基础,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也使得探讨大口尊传播路线成为可能。

一、大口尊的发现

(一) 海岱地区

海岱地区大口尊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2600年,可分为三期,早期为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3600年,中期为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3100年,晚期为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600年^[5]。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都有大口尊出土,早期大口尊出土较少,主要见于江苏邳县刘林遗址^[6]和大墩子遗址^[7]。刘林遗址出土5件大口尊,均为直口深筒形腹,圈底,器表饰有篮纹,口沿外壁施有弦纹;大墩子遗址出土1件大口尊M44:36(图1,

收稿日期:2021-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考古新发现视域下的先秦都城变迁与制度演进”(20BKG010)、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培养项目(LNSGYP20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昭峰,男,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连 116081),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及先秦史研究。王凯凯,男,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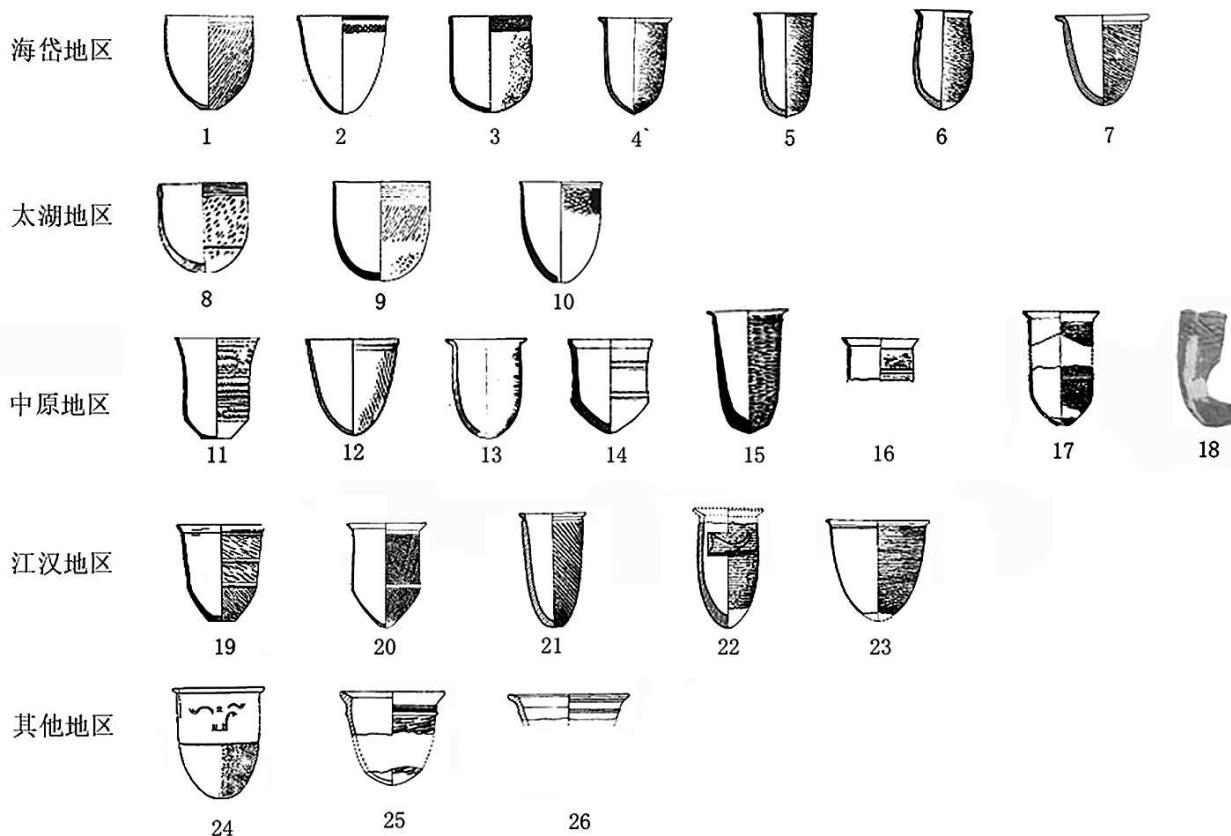


图1 各地出土的大口尊比较

1.大墩子M44:36;2.野店K1:1;3.刘林M192:1;4.尉迟寺F33:1;5.尉迟寺JS10:3;6.尉迟寺T2512⑥:3;7.花厅M50:58;8.张陵山M05:24;9.崧泽61T2:31;10.福泉山T3④:4;11.大河村W8:2;12.大河村T6③:16;13.黄楝树T6②:50;14.黄楝树H13:1;15.滑城H1:1;16.二里头H1:21;17.二里头H1:22;18.寨茨岗T2:107;19.屈家岭T138:2A(1);20.青龙泉H13:3;21.肖家屋脊H205:2;22.肖家屋脊JY7:9;23.肖家屋脊H183:7;24.北阴阳营H2:1;25.陆庄T0409⑥:6;26.陆庄T0309⑦:7

1),大口筒形腹,下腹逐渐收为小平底,口沿外壁施有4道弦纹。大汶口文化中期大口尊类型和数量增多,花厅遗址出土了17件大口尊^{[8]141-142},大汶口墓葬出土4件^{[9]90-91}。中期风格基本延续早期,但也有一些新变化,唇部明显变厚,下腹部内收程度变大。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口尊的数量显著增加,尉迟寺出土大口尊49件^{[10]a134-135;b136-139+214-215},陵阳河15件^[11],大朱村4件^[12]。晚期大口尊器形也有一定变化,器身明显拉长,口径与通高的比例由早期的1:1变为1:1.5,此外在陵阳河(图2,1)、大朱村、尉迟寺等遗址出土的部分大口尊上发现有刻划符号。

(二)太湖地区

太湖地区的大口尊主要见于崧泽、良渚文化。崧泽、良渚文化是太湖地区两支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崧泽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300

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良渚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至公元前2000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延至龙山文化时期。太湖地区共出土50余件大口尊,多见于大墓和祭祀坑中。崧泽、良渚文化大口尊是受到大汶口文化大口尊的直接影响形成的,体现在两地出土大口尊形制相似、发展演变相近。福泉山T3④:4(图1,10)^{[13]123-124}与野店K1:1(图1,2)^{[14]22-23}形制相似,均为敞口尖唇,圜底斜筒腹,口缘外施纹。崧泽61T2:31^{[15]46-47}(图1,9)、张陵山M05:24(图1,8)^{[16]25-36}与刘林M192:1(图1,3)形制相似,均为直口筒形深腹,腹饰篮纹。

太湖地区不仅吸收了大口尊器物本身,也继承了海岱地区大口尊的使用方式。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的大口尊主要见于祭祀坑和墓葬中,墓葬中发现的大口尊大多置于墓主足侧,随葬品丰富,这也反映出海岱地区与太湖地区先民存

在着密切的联系。

(三)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出土的大口尊见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数量较少,零星分布在豫中、豫西以及豫西南地区。中原地区位于海岱地区和江汉地区之间,这一地区既出土了与海岱地区花厅 M50:58(图1,7)相似的郑州大河村第五期 T6③:16 大口尊(图1,12)、与尉迟寺 JS10:3(图1,5)相似的偃师滑城 H1:1 大口尊(图1,15)^[17]以及与尉迟寺 F33:1(图1,4)相似的淅川黄楝树 T6②:50 大口尊(图1,13)^[18],也出土了与江汉地区青龙泉 H13:3(图1,20)相似的淅川黄楝树 H13:1(图1,14)以及二里头 H1:21(图1,16)、H1:22(图1,17)大口尊^[19]。此外,郑州大河村第四期出土1件大口尊 W8:2(图1,11),敞口、腰微束、折腹收成平底,口径23.2厘米、通高26.8厘米^[20]。原报告中称为盆,但笔者认为其既具有海岱地区大口尊如花厅 M50:58的一些特征,也具有江汉地区大口尊如京山屈家岭 T138:2A(1)(图1,19)的一些特征,可能是海岱地区大口尊演化为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口尊的过渡形态。因此,海岱地区大口尊应该是在中原地区经过发展演化后传播到江汉地区的。

(四)江汉地区

江汉地区的大口尊主要见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是江汉地区前后相继的两支考古学文化。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屈家岭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4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石家河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大口尊,主要分布在汉东平原、鄂东北及鄂西北地区,其中京山屈家岭晚期二段遗存出土2件^{[21]63-64},青龙泉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出土3件,大悟吕王城遗址出土2件^[22]。屈家岭文化大口尊与海岱地区大口尊在形制上有一定区别,主要体现在折沿变大、腹壁变直,上腹部一般有4道弦纹。

石家河文化大口尊数量显著增加,目前共出土200余件,主要分布在邓家湾^{[23]157-161}、肖家屋脊^{[24]165-172}等遗址。石家河文化时期大口尊来源有二:一是屈家岭文化,这部分大口尊保留了屈家岭文化大口尊直腹壁、腹部饰有弦纹的特点;二是来源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邓家湾和肖家屋脊遗址出土了一大批与尉迟寺遗址大口尊形制十分相近的大口尊,如肖家屋脊 JY7:9(图1,22)与尉迟寺 T2512⑥:3(图1,6)相似,肖家屋脊 H205:

2(图1,21)与尉迟寺 JS10:3(图1,5)相似。此外肖家屋脊遗址还发现了与尉迟寺遗址相似的大口尊套缸遗迹,两地套缸遗迹中均有许多大口尊底部被打破。不仅如此,石家河文化还发现了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除了刻划符号本身的差异之外,刻划符号的书写方式和书写位置均与尉迟寺遗址相近,两者应该存在着一定联系。

二、大口尊传播路径

大口尊最早出现于海岱地区,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大口尊见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刘林遗址和大墩子遗址。而太湖地区年代最早的大口尊见于崧泽文化晚期的张陵山、南河浜等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200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晚于海岱地区。两地最早的大口尊形制相似,如张陵山 M05:24 与刘林 M192:1。此外,海岱地区大口尊的数量和类型也比太湖地区更加丰富。因此大口尊应源于海岱地区,在此之后向太湖地区传播。

(一)大口尊向太湖地区的传播

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淮地区在南北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衰落,无力抵抗海岱地区和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扩张,成为两种文化交汇之地。

海岱地区和太湖地区可能在崧泽文化时期就产生了联系,海安青墩、沐阳万北、新沂小徐庄、邳县刘林和大墩子等遗址均有崧泽文化遗物出土^[25]。到良渚文化时期两地逐渐形成了海陆两条较稳定的交流通道。栾丰实先生认为海路是自长江入海口沿海岸线北上,自淮河入海口溯流而上沿水系进入大汶口文化势力范围或者继续北上在胶南、日照等地登陆^[26]。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据古地理研究,6000年前江淮地区的海岸线大致是北起连云港—阜宁—海安,然后向西折向泰州和扬州一线^{[27]92},当时江淮地区良渚文化的重要遗址如海安青墩、阜宁陆庄等均临海。此外良渚先民的航海能力并不差,我国稻作农业的北传就是由海路北上的,且年代比良渚文化更早^[28]。陈声波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北渐的陆路应该是从江阴渡海抵达海安青墩,并在此形成了青墩—蒋庄—开庄的三角形根据地,之后沿着地势平坦的江淮平原北上到阜宁射阳河流域,在此建立了第二个据点。最后渡过淮河抵达苏北地区,进入大汶口文化势力范围^{[29]185-200}。

笔者认为海岱地区大口尊应是经过上述通道传播到太湖地区的。早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以刘林遗址 M192:1 类型为代表的大口尊就顺着江淮通道南下到达了太湖地区。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两地联系更加密切,海岱地区的大口尊沿上述海陆两条路线南下,阜宁陆庄遗址出土的 2 件大口尊 T0409⑥:6(图 1,25)、T0309⑦:7(图 1,26)^[30] 形制与花厅 M50:58 相似,表明大口尊应该是经阜宁陆庄遗址南下的。海路由于目前海洋考古资料还不够丰富,并未发现大口尊,但山东日照临海,走海路十分方便,因此位于日照市的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类型很可能是在海路南下到达太湖地区的,南京北阴阳营 H2:1 大口尊(图 1,24)上的刻划符号^[31]⁸⁶⁻⁸⁸(图 2,2)与陵阳河遗址采集的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十分相似,正是海岱地区大口尊南传的反映。

(二)大口尊向中原地区的传播

大汶口文化早期就向中原地区扩张,河南郑州大河村二期、后王庄、石固等仰韶文化中期遗址都出土含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物,但该时期的传播规模较小^[32]。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西进规模扩大,大汶口文化首先进入豫东商丘、周口地区,形成了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33]。鹿邑栾台^[34]、郸城段寨^[35]、周口烟草公司仓库^[36]等遗址均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存,鹿邑栾台遗址出土的 H165:1 豆与枣庄建新 M71:6 形制相似,均为尖唇浅盘圈足,且柄部都有 3 排共 9 个圆镂孔。周口烟草公司仓库发现了 4 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 M1:3 背壶与大汶口 M70:2 背壶形制相似,均为圆唇侈口。郸城段寨早期墓 M2:2 陶豆与大汶口墓葬 I 式豆 M1:12 相似,均为浅盘折沿圈足,镂孔为三角形和圆形。除出土器物相似外,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葬俗与大汶口墓葬、邳县大墩子相似,周口烟草公司仓库 M3 墓主枕骨变形, M4 墓主切齿被拔除,郸城段寨遗址早期墓 M1 墓主外侧门齿被拔除。这说明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应该是大量大汶口

文化居民迁移后产生的,其文化面貌与海岱地区基本一致。不过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并未发现大口尊,可能是因为豫东地区的考古资料还不够丰富。

大汶口文化在占领豫东地区后继续西进到豫中地区,郑州大河村第四期和第五期分别出土 1 件大口尊。之后西进的大汶口文化与豫中地区的西阴文化碰撞形成了秦王寨文化,大汶口文化西进趋于停滞^[37],大口尊的传播也受到了影响。豫西地区仅偃师滑城和二里头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出土了 3 件大口尊,偃师以西地区几乎不见大汶口文化遗存,也无大口尊出土。只有豫西南地区淅川黄楝树遗址和唐河寨茨岗遗址^[38]出土了几件大口尊,这是由于北上到豫中地区的屈家岭文化返回江汉地区时带回了一部分大汶口文化因素形成的。

(三)大口尊向江汉地区传播

大口尊向江汉地区的传播主要分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两个阶段。

郑州大河村第四期和禹县谷水河第三期时期,屈家岭文化经豫西南地区北上扩张到豫中地区,在郑州大河村和禹县谷水河一带与大汶口文化相遇。郑州大河村 W8:2 盆与屈家岭晚期二段 T113:3A① 大口尊相似, M9:1 背壶与大汶口 M19:19 背壶相似。禹县谷水河遗址第三期遗址中 Y1:16 平底盆形鼎、Y1:2 斜腹杯、Y1:8 高圈足杯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遗物, Y31:35 宽肩壶、Y1:72 陶鬶等属于大汶口文化遗物^[39]。如前文所述,海岱地区大口尊可能是在郑州大河村演化成了 W8:2 大口尊的形制,之后又演变成了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口尊。

大汶口文化在豫中地区受到秦王寨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双重阻力之后无力西进,而屈家岭文化将包括大口尊在内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带回了江汉地区。大口尊随屈家岭文化从豫中南下到江汉地区的路线主要有三条(见图 3):第一条是从豫中地区出发到达淅川,淅川黄楝树遗址出土了 2 件大口尊。大口尊自淅川继续南下进入青龙泉遗址,青龙泉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出土了 3 件大口尊,此后大口尊顺汉水南下到达京山屈家岭区域。第二条路线是从豫中出发,南下穿过南阳盆地,到达江汉地区,南阳唐河寨茨遗址出土的 T2:107 残缸形器(图 1,18),夹砂红陶深腹圜底,口径 31 厘米、通高 40 厘米、厚 3 厘米,应该是件大口尊。第三条路线是从豫中出发到达信阳地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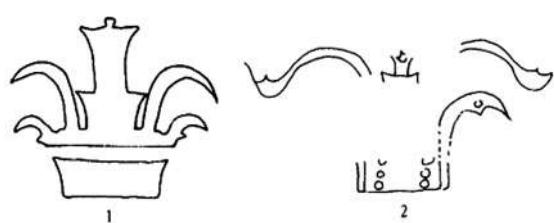


图 2 大口尊刻划符号比较 左:陵阳河;右:北阴阳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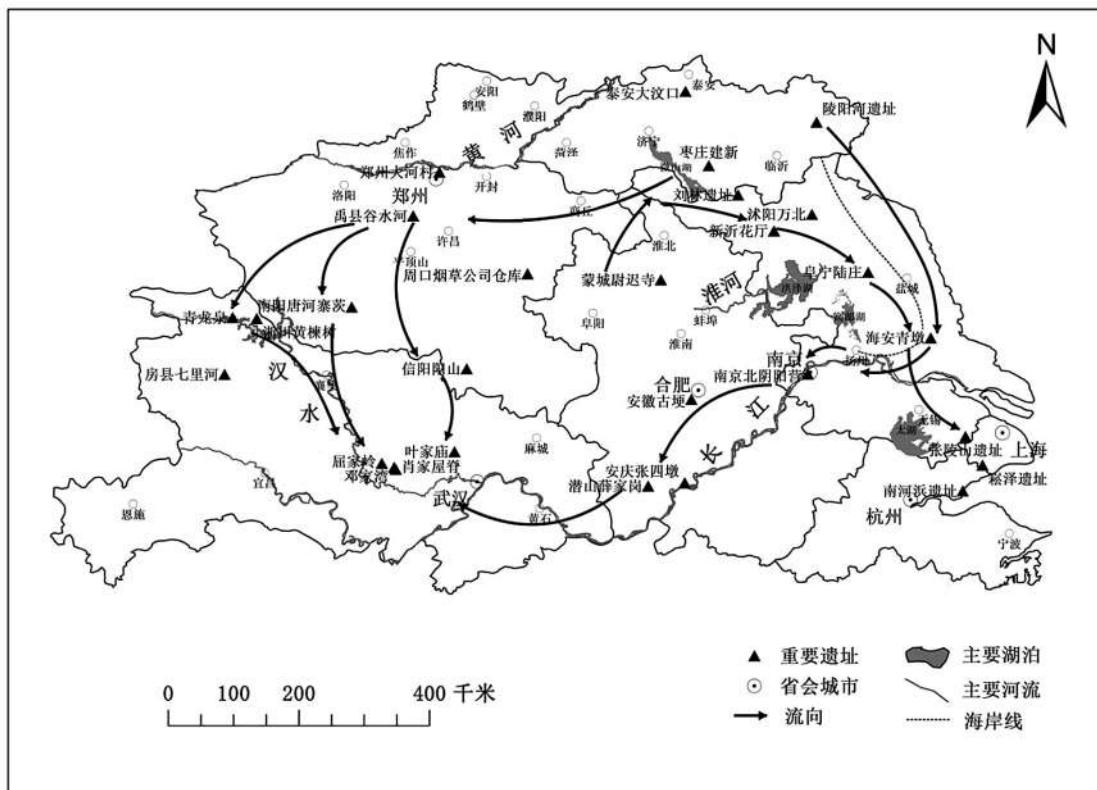


图3 大口尊的传播路径

后越过伏牛山一线进入屈家岭文化金鸡岭类型，再南下进入京山屈家岭区域。信阳阳山遗址中发现的圈足陶碗^[40]与山东枣庄建新遗址M82:3^{[41]122}相似；湖北大悟吕王城遗址出土2件大口尊，其形制与青龙泉屈家岭文化晚期以及京山屈家岭晚期二段遗存出土大口尊形制相似，正是这一传播链条的反映。

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强势的龙山文化阻断了江汉地区与海岱地区在中原地区交流的通道，海岱地区也开始进入龙山时代，但皖北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延续到了约公元前2400年^[42]。前文已提到石家河文化大口尊有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两个来源，王清刚认为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际海岱地区文化因素的南下路线是从尉迟寺出发，顺着淮河及以南水系到达六安—合肥一带，之后分为两路，东路去往宁镇—太湖地区，西路通过杭埠河抵达皖西南地区^[43]。但这条路线上的蚌埠禹会村^{[44]189-198}等重要遗址并未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存。因此笔者认为，大口尊是经江淮通道南下，然后沿长江北岸西进到江汉地区的。

大汶口文化晚期尉迟寺类型大规模南下，不过其并未从皖西地区南下，而是先经过安徽宿县

古台寺遗址北上到苏鲁皖交界处^[45]，肖家屋脊出土的大口尊H183:7(图1,23)与花厅M50:58形制相似，尉迟寺类型应是经过花厅遗址南下的。尉迟寺类型沿着江淮通道南下到海安青墩，分为两路，一路渡海南下到太湖区域，另一路沿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后一路先到达宁镇地区，宁镇地区是连接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枢纽，早在北阴阳营二期就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物，到北阴阳营三期又发现了与潜山薛家岗遗址三期陶鼎^{[46]299-300}相似的器物，到北阴阳营四期出土了一批包括H2:1大口尊在内的具有大汶口文化典型特征的器物。大汶口文化沿长江北岸西进的第二站应该是杭埠河流域，此地发现了大量大汶口文化晚期遗物^{[47]165-170}。沿杭埠河西进就到了皖西南地区张四墩类型势力范围。张四墩类型是皖西南地区继薛家岗文化之后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是薛家岗文化受到大汶口文化大规模冲击后形成的^[48]，其文化主体仅有少部分薛家岗文化因素，更多来自于大汶口文化，如张四墩类型中盛行的横篮纹装饰、侧装扁平三角足、长颈捏流鬶等器物均常见于大汶口文化^[49]。张四墩类型势力范围地处皖西南与江汉地区的交界处，是石家河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张四墩遗址有许

多器物与石家河文化相似,如H4:3黑陶弧形杯与麻城栗山岗T9④B:5^[50]相似。大汶口文化在皖西南建立了据点后与石家河文化产生了交流,大口尊由此传播到了江汉地区(见图3)。

三、大口尊的功能

目前学界对大口尊的功能还有不同的看法,王树明先生根据大口尊的刻划符号认为其是酿酒的器具^[51]。肖家屋脊遗址原报告根据大口尊敞口、直筒、厚底的特点判断大口尊是陶臼。邵望平先生根据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多出土于大墓且摆放位置讲究的特点判断大口尊是代表着身份地位的礼器^[52]。笔者认为生产工具的发展往往适应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口尊的演变同样适应着海岱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应将大口尊的功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大汶口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稻作农业的北传,海岱地区的粮食产量提高,剩余农作物的增加刺激了酒产量的增加。海岱地区酒文化的发展情况可以通过遗址出土的酒器反映出来,刘莉等先生在西夏侯遗址出土的高柄杯中提取到了酒的残留物^[53],山东大学也在焦家遗址出土的高柄杯中提取到了酒的残留物^[54]。高柄杯属于酒器性质应无可疑,酒器数量的变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汶口文化酒文化的发展情况。大汶口文化早期酒器较少,刘林遗址两次发掘仅出土了2件高柄杯。到大汶口文化中期,高柄杯数量有所增加。栾丰实先生在《海岱地区考古研究》中将大汶口遗址墓葬分为6段,到以M10和M123为代表的第5段中新出现了薄胎高柄杯,到以M25和M117为代表的第6段,高柄杯数量显著增加,仅M25就出土了16件高柄杯。大汶口文化晚期,酒器数量显著增加,仅陵阳河遗址就出土了600余件。此外,大口尊的形制也符合酿酒的要求,刘莉等先生通过对仰韶文化鼓腹罐、平底罐再到尖底罐三个阶段酒器的研究,认为尖底器更适用于酿酒,锥状底的发酵罐不仅方便分离渣滓,也有助于促进醪液温度均匀^[55]。该认识同样适用于大口尊,大口尊形制早期多为直筒圜底,整体矮胖;到中后期器身逐渐拉长、口微敛、底部变尖,有些内壁还发现有水锈状沉淀,可能就是酒的残留物。因此大口尊应该具有与酿酒有关的功能。

酒在生产力落后的史前时代有着重要的意

义。林惠祥先生认为,史前社会出现的巫觋经常通过绝食等方法令自己思想过度、想象错乱,从而认为自己沟通了上帝^{[56]263-267}。其实饮酒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甲骨文中的“酉”字可能是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象形,尖底瓶应是一种祭祀用的礼器,瓶中所装的可能是用于祭祀的酒^[57]。如此看来,大口尊有可能因为其与酿酒有关的功能被用作祭祀的礼器,这种现象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已经出现。刘林遗址中出土大口尊的M182中出土了两副龟甲,龟甲内均盛有小石子,可能是巫觋用作占卜的工具。由于社会上层掌握权力的需要,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口尊作为礼器的功能不断被强化,陵阳河遗址和尉迟寺遗址出土了腹部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尉迟寺遗址JS4中出土了有朱红色刻划符号的大口尊。

大口尊的功能在其传播过程中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中原地区郑州大河村遗址从第三期开始新出现了3件陶杯,第四期出土了2件陶杯和1件大口尊W8:2,第五期出土了7件陶杯和1件大口尊。这种酒器与大口尊同出的现象与海岱地区相似,表明两地区大口尊功能存在一致性。不过大河村W8:2将大口尊用作瓮棺葬葬具的做法可能对后来尉迟寺把大口尊也作为瓮棺葬葬具产生了一定影响。大汶口文化早期海岱地区大口尊就传播到了太湖地区,不过在其后的发展中,太湖地区似乎更加重视大口尊作为身份象征和祭祀的礼器,太湖地区出土大口尊的墓葬中都有大量随葬品,显示出墓主地位的高贵,此外大口尊还频繁出现在祭祀遗址中。江汉地区大口尊功能的变化分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两个阶段,屈家岭文化时期海岱地区大口尊的功能还以酿酒为主。京山屈家岭遗址分为早期、晚期一段和晚期二段,而大口尊仅见于屈家岭晚期二段,且晚期二段还出土了20余件斜腹杯,数量远多于早期和晚期一段。肖家屋脊遗址情况与京山屈家岭相似,报告将遗址分为两期,年代大致与京山屈家岭遗址晚期一段和晚期二段相对应,肖家屋脊第一期出土了10多件斜腹杯,未见大口尊。第二期共出土90件斜腹杯,其中M67:13杯中有木炭块,可能被用来过滤浊酒,第二期还出土了5件大口尊。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尉迟寺类型对石家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带来了具有浓厚祭祀礼器性质的大口尊,因此石家河文化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大口尊:一

种是源自屈家岭文化的,主要功能是酿酒,H434②:80大口尊腹部还有一个高圈足杯图案,足见大口尊与酒有关;另一种是从尉迟寺传播而来的,其形制与尉迟寺遗址大口尊相似,腹上部同样有刻划符号。这类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主要见于祭祀遗址,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遗址中,上百件大口尊共同组成陶缸遗迹,这种遗迹与尉迟寺陶缸遗迹相似,大部分大口尊缸底被打破,再连接到一起。显然,这些大口尊同尉迟寺遗址中大口尊一样,具有浓厚的祭祀礼器性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口尊最初是作为酿酒器具出现的,由于酒的珍贵性及其用于祭祀的神秘性,让大口尊带有浓厚的礼器神秘色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酒的产量提高,饮酒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社会上层为了巩固自身地位,逐渐强化了大口尊作为礼器的功能,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口尊成为重要的礼器,频繁出现在墓葬和祭祀遗址中。

四、大口尊传播背后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前文已提及,大口尊向江汉地区的传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属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前期。该阶段,中国上古社会正经历着巨大变化,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由于中原地区的炎帝部族逐渐衰落,蚩尤率领的东夷集团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张,蚕食着炎帝部族的势力。反映在考古学上正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逐渐衰落,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纷纷向中原地区扩张的时期。祝融在古史传说中是苗蛮集团的代表人物,《淮南子·时则训》说:“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司者,万二千里。”《越绝书·计倪内经》也有“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之火”。楚人一直将祝融作为自己的先祖,祝融八姓之一便是芈姓,屈原《离骚》有云“帝高阳之苗裔兮”,傅斯年认为此高阳氏应是祝融。但古书中多言祝融出于颛顼,《左传·昭二十九年》载“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而颛顼又是东夷集团的首领,《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的记载,《国语·楚语下》有“及少昊之衰也,颛顼受之”的说法。那为何东夷集团首领的后裔

会成为苗蛮集团的代表呢?韩建业先生认为东夷集团因为对外扩张的需要派遣祝融向中原扩张,最后到达了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大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华夏集团由于与东夷集团发生大战实力衰弱,南方的苗蛮集团趁虚而入,北上扩张到豫中地区,于是向西扩张的祝融部族在豫中受到了苗蛮部族的阻碍。《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墟也”,郑就在今天的豫中新郑一带,由此可见,祝融部族确实停留在了豫中地区。徐旭生先生也认为祝融部族的势力范围在豫中一带,当时还没有深入苗蛮^{[58] 63-66}。因此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在豫中相遇并碰撞的情况下,苗蛮集团吸收了祝融部族先进的文化并将其带回江汉地区,对苗蛮集团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许就是古史传说中将祝融作为苗蛮集团代表的原因。第二阶段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属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后期。关于五帝时代后期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的关系,有“舜征三苗”的传说。《墨子·非攻》记载了帝舜时期征伐苗蛮集团的情况:“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吕氏春秋·上德》也载有“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三年而三苗服”的说法。对比而言,前者可信度更高。帝舜属于东夷集团,孟子曰“舜生诸冯”,诸冯即今天的诸城、莒县交界处。据《尚书·吕刑》记载,帝舜命禹征三苗的原因是“苗民弗用灵”。灵者,巫也,帝舜发动战争的原因是因为苗蛮的宗教信仰与东夷不同。此战最后的结果是“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帝舜在征服苗蛮集团后,强迫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59]。这与考古发现何其吻合,石家河文化中出现的大型陶缸遗址,不正是大汶口文化侵入石家河文化强迫其使用大汶口文化祭祀礼器的证明吗?

崧泽、良渚文化一直与大汶口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栾丰实先生在《良渚文化的北渐》中提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地域相连,宗教信仰一致,习俗相同,都以大口尊为重器,两者可能是具有亲缘关系的两大集团,良渚文化可能是因某种原因南迁的大汶口文化的一支,其不断北上可能是一种返回家乡的寻根现象。

结 论

以上论述,对海岱地区大口尊的传播路径做

了探讨,其传播范围覆盖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现概述如下:

一是海岱地区大口尊是通过海陆两条路线传播到太湖地区的。陆路是沿新沂—沐阳—万北—阜宁—陆庄一线到达射阳河流域,之后南下至海安—青墩,最后到达太湖地区;海路是沿海岸线南下到达太湖地区。

二是海岱地区大口尊通过中原地区传播到了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大口尊是大汶口文化扩张到豫中地区后受到秦王寨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阻拦后,北上的屈家岭文化吸收了包括大口尊在内的一部分大汶口文化因素后分三路南下传播到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口尊是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遗址的大口尊经江淮通道南下后再沿长江北岸西进传播到江汉地区的。

三是大口尊可能是史前海岱地区掌握在上层社会手中的一种酿酒器物,因为酒的神秘性和珍贵性而附带了一些礼器的性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口尊作为礼器的功能被强化,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口尊频繁的出现在墓葬和祭祀遗址之中。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大口尊的功能也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四是大口尊的传播所反映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能与古史传说中上古时代华夏、苗蛮、东夷三大集团的关系联系起来,对研究我国古史传说时代、重建中国史前史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恒武.良渚文化综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 [2] 韩建业, 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J].中原文物, 1996(4): 44-49.
- [3] 高广仁, 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5.
- [4] 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6]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J].考古学报, 1965(2): 9-47+152-165+180-183.
- [7]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J].考古学报, 1964(2): 9-56+205-222.
- [8]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
- [9]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4.
- [10]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 [11] 山东省考古所, 山东省博物馆, 莒县文管所.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J].史前研究, 1987(3): 62-82+99.
- [1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莒县博物馆.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J].考古学报, 1991(2): 167-206+265-272.
- [13]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0.
- [14]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 [15]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7.
- [16]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M]//文物资料丛刊:6.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
- [17]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 1964(1): 30-35+8.
- [18]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 1990(3): 1-69.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J].考古, 1982(5): 460-462+565.
- [20]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 1979(3): 301-375+403-416.
- [2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5.
- [22] 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大悟吕王城遗址[J].江汉考古, 1990(2): 31-43.
- [2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
- [24] 湖北荆州博物馆等.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
- [25] 郝明华.苏皖江北地区的崧泽文化因素[J].东南文化, 2001(5): 18-23.
- [26] 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北渐[J].中原文物, 1996(3): 52-59+32.
- [27] 邹厚本.江苏考古五十年[M].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0.
- [28] 徐昭峰.我国稻作农业的北传[N].光明日报, 2009-12-01(12).

- [29]陈声波.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 [30]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苏阜宁陆庄遗址[M]// 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 [31]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 [32]魏兴涛.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J].华夏考古,2012(2):25-46+155-156.
- [33]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J].考古,1992(2):157-169+181.
- [3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栗台遗址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1989(1):1-14.
- [35]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J].中原文物,1981(3):8-12.
- [36]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J].中原文物,1986(1):1-3.
- [37]单思伟.屈家岭文化研究[D].武汉大学,2018.
- [38]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1963(12):641-645+667+5-6.
- [39]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79(4):300-307+386-388.
- [40]河南文物工作队信阳发掘小组.河南信阳市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记[J].文物参考资料,1955(8):59-67.
- [4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 [42]苗霞.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及其年代与分期[J].考古与文物,1998(6):33-49.
- [43]王清刚.简论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之交海岱地区文化因素的南下[J].东南文化,2017(3):73-81.
-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蚌埠禹会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安徽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93(12):1062-1075.
- [4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47]安徽文物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4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安庆市张四墩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4(1):20-31.
- [49]朔知.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J].南方文物,2006(2):58-64+30+47.
- [50]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黄冈地区博物馆,麻城市革命博物馆.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0(4):439-473.
- [51]王树明,王占芹.考古发现中的陶缸与我国古代的酿酒[J].海岱考古,1989:370-389+418+420.
- [52]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J].文物,1978(9):74-76.
- [53]刘莉,王佳静,陈星灿,梁中合.山东大汶口文化酒器初探[J].华夏考古,2021(1):49-61.
- [54]张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葬仪与社会权力分配[D].山东大学,2018.
- [55]刘莉,王佳静,邸楠.从平底瓶到尖底瓶:黄河中游新石器时期酿酒器的演化和酿酒方法的传承[J].中原文物,2020(3):94-106.
- [56]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57]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J].考古,1991(12):1109-1118.
- [58]徐旭生.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59]常兴照.少昊、帝舜与大汶口文化:下[J].文物春秋,2004(1):1-10+59.

Research on the Spread Route of Big Opening Zun in Prehistoric Haidai Area

Xu Zhaofeng and Wang Kaikai

Abstract: Big Opening Zun is a typical artifact of Dawenkou Culture period in Haidai area. It was also found in other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such as Taihu Lake, Central Plains and Jianghan area about the same period. The Big Opening Zun in Taihu Lake, Central Plains, Jianghan and other areas spread from Haidai area. The spread route of Big Opening Zun in Haidai area spread to Taihu Lake area through sea and land routes, and to Jianghan area through the Central Plains. Finally, the function of Big Opening Zun correspond to the activities of Dongyi, Huaxia, Miaoman and other groups in ancient history legends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prehistory.

Key words: Big Opening Zun; spread; route

[责任编辑/云 扬]